



楚辞



楚 晖

(二)

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44,000 字

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800

统一书号：11106·143 定价：0.74 元

楚 晖

丛 书

第二辑 目 录

—— 史 料 ——

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	何 浩 农永清(1)
党的几位主要创始人最初来武汉的一些史实·····	曾宪林(18)
武汉地区早期党组织概况(1920年—1927年)	
·····	李婉霞 张志善 郑自来 王欣飞(32)
武汉早期的革命报刊简介·····	廖 芬(41)
建党时期湖北的工人运动·····	廖鑫初(53)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	章 志(84)
项英与“二七”大罢工·····	志 山(88)
湖北女师学潮·····	之 善(92)

目 录

- “八七会议”及其前后的若干史实……………李子仪 周 斌(98)
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始末 ……………毛 磊 袁继成 刘继增(114)

—— 专题研究 ——

- “五四”前后的董必武 ……………肖沫香(130)
陈潭秋的早期革命活动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陈潭秋传》编写组(143)
李达早期的爱国思想及其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宋镜明(159)
大革命时期恽代英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张光宇(172)

马 克 思 主 义

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

何 浩 农永清

(一)

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流传。辛亥革命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还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片断。以后，《新民丛报》、《浙江潮》、《天义报》、《民报》和《东方杂志》等报刊，也对各派社会主义作过一些介绍。但是，这些介绍都比较零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也不成熟，所以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真正广泛、系统、深入地传播、扎根，还是在一九一七年之后。

苏俄十月革命的炮声，震动了全世界，也惊醒了中国知识界的先进分子，促使他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少数急进的民主主义者首先转向了共产主义。李大剑最先发表了直接讴歌苏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一些报刊也纷纷报道苏俄革命的情况。“五四”运动，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传播。《新青年》、《星期评论》、《新潮》、《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共产党》月刊，以及



图为《新青年》封面。

宋镜明供稿

《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都十分活跃地进行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评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的报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俄罗斯研究”专栏，有的杂志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建立起来了。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

原著，以及《资本论入门》、《马克思传略》、《社会主义史》等书籍，也陆续翻译出版。一九二一年党的“一大”后，李达主持的人民出版社，制订了出版十五种马克思全书、十四种列宁全书、十一种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者）丛书计划，短期内翻译编印和重印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工钱劳动与资本》、《共产党星期六》、《苏维埃论》、《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十五部著作。由此，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形成了一股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潮流。

（二）

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北京大量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

籍，以及许多进步报刊的发行，给武汉地区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方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武汉地区同全国各地一样，马克思主义首先也只是为极少数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而后通过他们的媒介与宣传影响，方形成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武汉，这一特点及其作用的集中代表，就是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同志。

董必武青年时期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一九一七年留学日本时，受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苏俄十月革命后，董必武极为关注，多方收集、了解这次革命的有关资料。一九一九年春，董必武在上海结识了对马克思主义作过一些研究、并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李汉俊以后，在政治思想上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到一九三七年，董必武还尊称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①。这次在上海的半年时间里，董必武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入门》和《政治经济学入门》等书籍，还从李汉俊那里借读了许多日文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由此初步树立了走苏俄革命道路的共产主义信念。为了建立一个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以培育一代新人的据点，一九二〇年春，在陈潭秋的大力协助下，董必武办起了武汉中学。此后，他对武汉中学、湖北女师和各个进步群众团体，倾注全力做了许多的宣传组织工作。在课堂上，他除一般地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外，还专门在女师部分学生中讲解过“共产主义ABC”以及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情况；并且通过利群书社等渠道，引进大批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供各校师生阅读。“如《共产党宣言》、《俄国新经济政策》及《新青年》、《共产党》、《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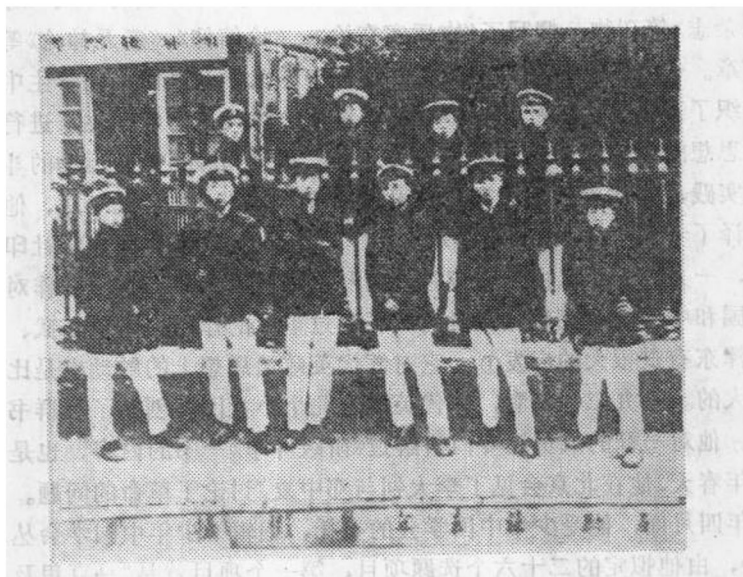
^①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二）第292页。

论》、《觉悟》、《向导》等都在武汉中学流传过”^①。通过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启蒙教育，一部分师生逐步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先后参加了革命。武汉地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首先就是从武汉中学的学生中吸收的。一九二三年，董必武将武汉大中学校毕业的黄安籍学生中的党团员，组成“赴黄安党的工作组”，到大别山区开展建党工作，其中的主要成员如王健、雷绍潜、董珏生，就是武汉中学的学生；后来成为黄麻地区农民运动及黄麻起义领导人的戴克敏、曹学楷、王秀松、汪莫川，也都是武汉中学毕业的^②。可以说，董必武在对武汉地区的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方面的工作，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武汉地区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就读于武昌高师时，就热心于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上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的文章，特别是《新青年》上刊登的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使他看到了中国未来的道路。“五四”运动中，他和恽代英等组织领导了武汉地区的示威游行等爱国活动，并撰写了一些学生运动的文章，刊载于汉口《大汉报》和《新闻报》上，成为武汉地区学生运动很有影响的人物。一九一九年夏，陈潭秋被选为学生代表，到南京、上海学习参观。在上海，他结识了董必武，从此，他们结成了革命战斗友谊。此后，陈潭秋就在董必武的影响下，直接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回汉以后，他和董必武一起筹办了武汉中学，后来又同张梅先、吴德峰、钱介盘等人先后创办了共进中学、崇实中学。他利用在武汉中学、武昌高师附小、湖北女师、共进中学等校兼课的便利，向学生讲解

^{①②}武汉中学：《朴诚勇毅干革命——缅怀董必武同志在武汉中学的光辉实践》，见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忆董老》第一辑，第123、126、127页。

人类进化的历史，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罪行，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他积极向学生推荐革命刊物，并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就等于聋子瞎子，找不到路。”^①在陈潭秋的宣传和影响下，仅在当年武昌高师附小伍修权学习的那个班，先后就有吴楚桢、伍修权等十人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②；湖北女师的学生掀起了著名的“女师学潮”；



这是一九一八年暑假互助社成员合影，系互助社最早成员。前排左三是恽代英，右三是林育南。

湖北省博物馆供稿

^①转引自《为新中国而奋斗——缅怀陈潭秋烈士的革命业绩》，《江汉论坛》1979年第4期。

^②据伍修权回忆。

女学生徐全直、酆俊美、陈慕兰、马玉香、周月华、钱瑛、戚元德、夏之栩、李文宜、袁震等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与陈潭秋和董必武等的辛勤教育启发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恽代英及其利群书社，起了重要作用。恽代英在一九一三年就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来创办的互助社、利群书社等，也和这个影响有关。一九一五年以来，为宣传新思想，他为《光华学报》、《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撰写了《物质实在论》、《论信仰》、《新无神论》等文章。一九一七年后，他先后在武昌中华大学及其附中的学生中组织了互助社、仁社和新声社，团结了一批先进青年学生，进行新思想的研究，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通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斗争实践，恽代英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一九一九年底，他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书，一九二〇年先由尚志学社印出，一九二一年又由新青年社作为丛书第八种出版。这一著作对俄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起过重大的作用；对董必武、毛泽东有过很大的启发^①；它对恽代英政治思想上的触动也是比较大的。一九二〇年春，恽代英联合几个小社团，创办了利群书社。他对书社的成员还专门讲解过《阶级斗争》一书的内容。也是这年春天，他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与邓中夏，讨论了革命的问题。这年四月间，他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由他拟定的二十六个选题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马克思及其学说”，其次则为克鲁泡特金、罗素、泰戈尔、杜威等人及其

^①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说过：“记得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本《社会主义史》。我知道了人类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学说^①。同年秋，他又翻译了《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②。一九二一年七月中旬，在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廖焕星等的倡议下，在黄冈浚新小学召开了利群书社及与其有联系的各团体代表大会，讨论了书社的工作和改造社会的问题。决议成立“波歇维”（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定名共存社。并明确宣布其宗旨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③这表明，恽代英已经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个时期，林育南、刘伯垂、包惠僧等，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武汉的传播，也做了许多工作。

在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的积极宣传带动下，武汉地区，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了。这就为这个地区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创造了较好的思想条件。而当时武汉地区工业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也已为这种思想的生根、发展准备了阶级基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三）

在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影响的深入传播，以及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在上海党的发起组的直接帮助、指导下，经过董必武、陈潭秋等的组织串连，一九二〇年秋，武汉地区的党组织——武汉支部诞生了。

①恽代英：《对于〈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编辑方针的意见》，《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57页。

②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节译，刊载于《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20号（1920年10月）。

③《我们的》第7期，1921年8月。

建党之时，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都不高，除董必武、陈潭秋初步阅读过部分原著外，大多数党员对于共产党的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了解得不够深透。正如包惠僧一九五三年九月回忆的那样：“我们对于学习马列主义知识是太少了，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的^①。因此，建党初期，摆在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党员进行学习，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的头脑。当时学习材料的来源，除利群书社、时中书社等书店公开出卖的以外，主要是依靠党的上海发起组分发供应。一九二〇年秋，刘伯垂在上海被陈独秀吸收入党后，从上海带回了一份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还有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以及有关苏俄革命的小册子。这是党员学习的第一批党的文件和革命书刊。以后，党员通常的读物，主要有：“《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杂志、李汉俊译的《资本论浅说》及《共产党月刊》、考茨基的《唯物史观》、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传略》”，甚至也有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著作^②。党支部每星期开会一次，几乎每次都要做读书报告或国内外时事报告。一九二〇年冬，党的上海发起组成员、被人称为“马克思学者”^③的李汉俊到汉。武汉支部为此专门集会于董必武的住宅，请李汉俊讲“唯物史观”问题。另外几次，李汉俊还向支部成员讲解过西欧各国社会主义的情况。这些都直接帮助党员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理解，扩大了党员的视野，并且进一步诱发了大家学习基本理论的兴趣和热情。党支部成了党的理论学校。此后，李汉俊实际上成了武汉支部和武汉一些大中学校辅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①②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313页。

③参阅1979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所载茅盾的《回忆录》。

理论教员。

除了在党内抓党员的基本理论学习外，武汉支部还着重抓了群众团体的工作：组织新的革命团体，联系原有的进步社团，将马克思主义直接扩大深入到进步青年中去，推动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壮大党的队伍。

参照上海党组织的经验，武汉支部成立不久，就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具体工作由陈潭秋负责。当时主要是以各个党员教书的学校为基地，把那些倾向进步的学生如夏之栩、马念一、范正松等吸收进来组成。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半公开的组织，每星期开会一次，每次都有宣传报告。当时的主要活动也还是组织团员阅读《新青年》、《共产党》等革命刊物，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关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

一九二一年三月，支部还组织了一个有二十多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成员多数是五四以来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既有青年学生，也有教职员工。研究会每次在武汉中学开会，除分发有关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情况的小册子等宣传品，供给会员学习研究外，还轮流由党员做读书报告，交流学习经验。李汉俊就向研究会作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告。研究会是公开的革命团体，党支部把它作为党进行公开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并通过这些会员把革命思想传播到各方面去。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黄负生、刘子通、施洋等许多会员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支部还通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活动，在大中学校组织了学生会、青年读书会和妇女读书会。武汉中学在开办后不久，就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这是领导学生运动的公开学生组织。自治会办有《武汉中学周刊》，主要是反映武汉各个学校的动态，交流学生运动的情况。妇女读书会，是由在湖北女师任教的陈潭秋、黄

负生、刘子通三人在该校的女学生中首先组织起来的。读书会成立后，比较有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也听过董必武、李汉俊关于妇女问题等的报告。这些女青年更乐于在老师的直接指导下进行讨论。开始，学习材料上的一些词语、段落，即使是象《共产党》月刊创刊号上的“短言”，有很多她们也理解不了。陈、黄、刘除了给予详尽的讲解外，陈潭秋还很注意启发她们理论联系实际，掌握精神实质。陈潭秋在领导她们学习讨论《共产党》月刊第四号中的《告劳兵农》时，曾经指出：“我们不是为了咬文嚼字才来办读书会，才来学理论的，我们学习它，是为了要用它，用它来救我们的国家，来救受压迫的劳动人民。”^①在马克思主义的阳光雨露滋润下，在武汉支部的启发引导下，这十来个女青年加入了革命的行列。其中钱瑛、夏之栩、袁溥之等后来成为了党的领导干部，有的如徐全直、鄧俊美、陈慕兰等，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她们的宝贵生命。

武汉地区原有的社团，最有影响的，还是由恽代英于一九二〇年二月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书社不单纯是一个出售书报的营业书店，还“是一个文化运动的场所，是一个修养会社的结晶体，是一个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的雏形”^②。也就是说，它是传播新文化和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但对外而言，“销售各种新书报”，毕竟还是书社的一项主要工作。由于其成员大都是倾向新文化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由于它早就与新青年社、后来又与人民出版社有着业务上的联系，所以，它的营业方针决定了书社除经销一般书报外，还大量销售过当时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

^①黄 钢：《革命母亲夏娘娘》，第 17 页。

^②《利群书社》，《互助》第 1 期，1920 年 10 月。

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所有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新青年》、《共产党》、《湘江评论》、《星期评论》、《新潮》和《武汉星期评论》等革命刊物，以及办有进步副刊的《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北京晨报》等报纸。这就使利群书社事实上成为了公开供应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报刊的一个重要基地，成为向武汉进步青年学生提供革命理论的资料库和阅览室。它在武汉以至长江中上游地区，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思想方面，是起了重大的作用的。有这样一个事例，很可以说明它的影响和作用：吴德峰在一九五六年回忆说，“记得我在‘五四’后要求进步，但找不到门路，看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书，被一位朋友知道了，介绍我到利群书社去看书”^①，由此接触了进步书刊，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是当时进步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通常途径。

另一方面，从内部的要求说，利群书社又是一个讲求“修养”、试验共同生活的团体，并且有着明确规定的学习制度。以恽代英为首的书社成员，都曾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的思想影响。在如何改造社会这个问题上，或多或少地都掺杂有空想的成分。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书社的成员在思想认识上也发生着变化。为争取、团结书社成员，推动他们政治思想上的转化，武汉党支部主动对他们做过一些工作。早在一九二〇年二月，陈独秀来汉讲学时，就会见过利群书社的成员。恽代英到北京时，李大钊、邓中夏与他促膝谈心。武汉党组织成立后，上海党的发起组就建议武汉支部吸收利群书社的成员。刘伯垂、陈潭秋和包惠僧，曾访晤过恽代英以及林育南、

^①《党成立前后武汉地区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357页。

李书渠、廖焕星、卢斌(陆沉)等。党支部还给利群书社“贴补”过“一些钱”，使“书店的规模才扩大些”^①。上海党的发起组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第一号至第五号社论性质的“短言”和一些专文中，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了连续的批判。这无疑对利群书社的成员产生了极为有益的影响。在《共产党》月刊创刊之前的一九二〇年十月，恽代英在书社创办的刊物《互助》第一期上发表了《未来之梦》一文，虽然自我批判地指出了：“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的”，“工读互助团的覆辙亦决不是法子”，但又提出：依靠“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②。围绕着“共同生活”的问题，书社成员开展了一次长达半年的大讨论。书社在他们编印的刊物《我们的》上面，登载了一些不同意《未来之梦》的观点的文章。正在北京求学的林育南还数次给恽代英写信，对这种“理想”的“梦”进行了直接的批评^③。这标志着利群书社成员的新村主义思想的影响已在根本上大为缩小。陈独秀看过《未来之梦》后，曾批评说：不从改造社会入手，革命就是“痴人说梦”^④，这更使恽代英受到很大的震动。一九二一年春，党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收了利群书社主办《武汉星期评论》的编辑黄负生、刘子通参加学习，随即成为了利群书社最先入党的两个同志。同年冬，又吸收书社的林育南为武汉学生的代表，出席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林回国后，加入了党的队伍。接着，恽代英、李书渠、李求实等也都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冬，原来由书社主办的《武汉星期评论》，转归

①吴德峰：《党成立前后武汉地区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357页。

②《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

③《毓兰给代英的信》，《我们的》第6期，1921年6月1日。

④访问李伯刚(即李书渠)记录，1966年2月15日。

武汉党支部领导了。在这之后，董必武、李汉俊、陈潭秋、肖楚女等都为这个事实上的党刊写过文章，使刊物在揭露宗教本质、批判改良主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指导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读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马克思主义武装了武汉党组织的成员，武汉党组织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团结、教育了一大批先进的知识青年。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深入的传播中，又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但是，在初期，这个队伍的组成，主要的还是革命的知识分子。

(四)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是，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教育和武装工人阶级，才能使它认识本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任务，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因此，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是党组织的主要任务，也是促使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与研究工人阶级的劳动与生活状况，是知识分子开始与工人群众结合的必要方法。武汉支部成立以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对工人进行过访问，对武汉某些工厂工人的分布和工资，男工、女工和童工的状况，作了初步的调查。但是，真正对工人接触了解，特别是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还是在支部成立以后。董必武回忆说：党员“到纱厂去，到铁路上去，到码头上去。经过同乡和亲戚关系找工人谈话，讲解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①，做了大量的启蒙教育工

^①董必武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一年。